

甬上讲经会与黄宗羲重经思想的传播

吴海兰

提 要 黄宗羲重视经学, 倡导以经学纠理学之偏, 甬上讲经会就是在这思想的指导下创立的。讲经会持续八年,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: 扭转了明末浙东的不良学术风气, 推广了讲经事业, 并培养了一大批有所成就的学者。

关键词 甬上讲经会 黄宗羲 经学

一

甬上讲经会, 学术界一般笼统称之为甬上证人书院。^① 甬上讲经会的建立, 基于黄宗羲的以下认识: “嗟六经之奥旨兮, 犹射者之布鹄, 挽一人之矢兮, 不如众人之弋获”。^② “天下之最难知者, 一人索之而弗获, 千万人索之而无弗获矣。” (《全集》第 1 册, 48 页) 众人的力量远胜于单枪匹马, 这是黄氏组织讲会的思想基础。此外, 先贤在讲会方面的成功经验也是重要的参考依据: “制科盛而人才绌, 于是当世之君子, 立讲会以通其变, 其兴起人才, 学校反有所不逮”。如朱子之竹林, 陆子之象山, 五峰之岳麓, 东莱之明招等, 王阳明之时, 讲会遍天下; 后来讲会衰落, “犹吴有东林, 越有证人, 古今人才, 大略多出于是”。 (《全集》第 10 册, 第 452 页)

“越有证人”, 即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(戡山)在会稽设立的证人书院, 崇祯十七年(1644)罢讲。二十四年后, 即康熙六年(1667), 黄宗羲与同门姜定庵恢复讲会, 整理戡山遗书, 但并未在当地产生良好的效果, “越中类不悦学, 所见不能出于训诂场屋”。所幸在相邻的甬上产生了始料未及的积极影响: “甬上之闻风而兴者, 一时多英伟高明之士”, 许多优秀的学子纷纷前来求学, “明年, 余至甬上, 诸子大会于僧寺, 亦遂以证人名之。” (《全集》第 10 册, 第 466 页) 按通行的说法, 这就是甬上证人书院。后来全祖望正是如此追述其来历: “证人书院一席, 戡山先生越中所开讲也, 吾乡何以亦有之? 盖梨洲先生以戡山之徒, 申其师说, 其在吾乡, 从游者日就讲, 因亦以‘证人’名之, 书院在城西之管村, 万氏之别业也。”^③

本文没有沿用“甬上证人书院”的名称, 是因黄氏弟子的文集中提及最多者仍为“讲经

① 方祖猷《黄宗羲与甬上证人书院》,《浙江学刊》, 1985(2)。

② 《黄宗羲全集》第 10 册,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, 第 643 页。下文本书一律简称《全集》, 随文注出引文页码。

③ 全祖望《全祖望集汇校集注》,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, 第 1059 页。

会”。如郑梁多次称“丁未(1667年)同受学于黄门,因同倡讲经之会于甬上”^①;李文胤记述“年来郡中诸子共事姚江黄先生,学术文章俱得见其本末,因唱为讲五经之会”^②;黄百家也记载“岁丁未,家大人始命余从学甬东,是时甬上陈子夔献(名赤衷)、陈子介眉(名锡嘏)、万子公择兄弟、范子光阳(字国雯)等十余人,方为讲经之会”^③。至于黄宗羲本人的文集中,也是“讲经会”的名称更为多见。因此,有学者提出甬上证人书院虽于1668年命名,仍不废讲经会的旧称。^④但范光阳明确提出先有“证人之会”,后有“五经讲会”:

戴山刘忠正公之学,自吾师姚江黄梨洲先生始传于甬上。其时郡中同志之士十余人皆起而宗之,以为学不讲则不明,于是有证人之会。月必再集。初讲《圣学宗要》,即戴山所辑《先儒粹言》也。同志之士,得携其门人子弟,相与质疑问难。其后为五经讲会,亦如之。^⑤

往时吾甬上同人之学,盖凡数变。其始为时文之会,……继为诗古文之会,……其后稟学于姚江黄先生,得闻戴山之绪论,于是取濂、洛、关、闽之书各相证悟,最后则为五经之会。^⑥

郑梁的诗中也反映先习戴山理学,尔后才学经书:“天幸丁未夏,遇师甬江浒,得闻戴山传,不觉志气鼓。慎独谈何易,读书勇可贾,良朋月再会,穷经订兰谱。”^⑦因此笔者认为,黄宗羲所说的“遂以证人名之”很可能就是“证人之会”,如果我们要采用“甬上证人书院”的名称,那么它应该包括证人之会与讲经会。

会稽证人书院早于甬上证人书院,后者是在前者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;二者的研读目标也有不同,前者以阐发戴山理学为主,“几致门可罗雀”,后者以发扬经学为主,“却汇为一时尚尚”。有学者提出黄宗羲本想昌明戴山之学于天下,结果缺乏传人,却在无意之中开辟了一个经学昌明的时代。^⑧这种看法值得商榷。毋庸置疑,黄宗羲对戴山之学的阐发是很重视的。“证人之会”的讲授重点即是戴山之学,黄氏弟子的文集中多次提到学习“子刘子之学”:如倡导讲经会最为得力的陈赤衷,被黄宗羲授以“戴山《人谱》,绍其绝学”;《杲堂诗文集》,第459页)万斯同被人称作“学无不窥,而以山阴戴山先生为宗主”^⑨;范光阳也说与郑风等“同洒扫黄门,获闻戴山绪论,圣贤自期”^⑩。李文胤也提及诸人“始从黄先生所得读子刘子遗书,即共喟然发愤,谓戴山坠学,当藉姚江以季兴”。《杲堂诗文集》,第625页)黄氏的弟子们还试图将戴山之学发扬光大。如万斯大在西陵讲学,“使一时学者,由甬上之学而溯之姚江,由姚江之学而溯之戴山。”《杲堂诗文集》,第448页)陈

① 郑梁《寒村诗文集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六,齐鲁书社1997年版,第326页。

② 李文胤《杲堂诗文集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,第619页。下引此书只随文注出书名及页码。

③ 黄百家《学箕初稿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七,第769页。

④ 徐定宝主编《黄宗羲年谱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,第187页。

⑤ 范光阳《双云堂文稿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六,第649页。

⑥ 范光阳《双云堂文稿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六,第636页。


⑦ 郑梁《寒村诗文集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六,第60页。

⑧ 刘述先《理学殿军——黄宗羲》,载于《黄梨洲三百年祭》,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,第13页。

⑨ 杨无咎《万季野先生墓志铭》,《石园文集》附录,《四明丛书》第4集。

⑩ 郑风《寒村息尚编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六,第595页。

锡嘏则告诫其弟子“明儒之书以刘子为主”，并特别强调“刘子之学，真从沉潜刻苦得来，纵或一时未明，须为痛加理会，不可草草读过，便生妄议”。^① 戴山理学未能昌大，实与当时学术界大肆批判王学、朝廷鼓吹程朱理学的大背景有关，黄宗羲及其弟子是无力扭转整个学术趋势的。

黄宗羲重视发扬师说，但也重视经学，他是要以经学来纠理学之偏，其对经学的开启并不是无意识的行为。讲经会以康熙四年(1665)成立的甬上策论会为基础而建立。甬上策论会本是由万氏子侄为主的文业之会与董允、兄弟、陈锡嘏、陈赤衷等人成立的园社合并而成。康熙六年(1667)众人前往余姚求教于黄宗羲。在黄氏的指点下，策论会改名讲经会。^② 万斯大之子万经曾记述此次活动道：“丙午、丁未间(1666—1667年)，(万斯大)偕公择五伯父、允诚、季野两叔父、贞一兄，订里中同志陈夔猷、范光阳、董在中、二嘉、巽子、陈同亮、锡嘏、董俟真、吴仲、郑禹梅、王文三、张梅先、钱汉臣，奉父执梨洲黄先生为师，宗戴山慎独之学，随举讲经会”。^③ 此次访学后，学会名称的更换，表明经学成为众人治学的明确目标。这直接受到黄宗羲的影响：“自十年以来，吾甬上诸君子，尽执义梨洲黄先生门。先生尝叹末世经学不明，以致人心日晦，从此文章事业俱不能一归于正。于是里中诸贤倡为讲五经之会。”“黄先生教人必先通经，使学者从六艺以闻道，尝曰：‘人不通经，则立身不能为君子，不通经，则立言不能为大家’。于是充宗兄弟，与里中诸贤共立为讲五经之集。”(《杲堂诗文集》，第445、448页)通经是立身的根本，也是立言的基础，尤其有利于纠正“人心日晦”的社会不良风气，挽救学术的退化。由此可见经学在黄宗羲心目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，我们怎么能说其后经学的昌明，是其无意识的结果呢？

关于甬上讲经会研读的内容，黄宗羲有所提及：“穷搜宋元来之传注，得百数十家，分头诵习，每月二会，各取其长，以相会通。数年之间，毕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三礼》”。(《全集》第10册，第681页。)“数年之间，仅毕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三礼》”。(《全集》第10册，第453页。)其弟子们的相关记载也不少，如李文胤曾提及“大《易》已毕，方及《礼经》”。“吾党讲《礼》将毕，次及《春秋》”。(《杲堂诗文集》，第448—449页)万斯大之子万经也有记述：讲经会“每月两集，首《礼》、次《易》、次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”。^④ 可见关于六经的讲解次序，李文胤与万经的记载有分歧。郑梁则说陈赤衷“讲《易》、讲《诗》、讲《三礼》、讲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通鉴》，穷一经综万事，汇众说，质一心……”。^⑤ 这与黄宗羲的记述比较接近。因此，经书讲解的先后次序很可能是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居前。无论如何，说明五经中《易》与《礼》最受重视。这大概与黄宗羲的经学兴趣有关。因其经学研究以《易》与《礼》所占的比重最大，有专著《易学象数论》与《深衣考》。

讲经会开展时，黄宗羲没有经常在场，但他左右着其内容与进展情况。“先从黄先生所授说经诸书，各研其义，然后集讲。黄先生时至甬上，则从执经而问焉。”(《杲堂诗文

① 陈锡嘏《兼山堂集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四七，第513页。

② 参见方祖猷《黄宗羲与甬上证人书院》，《浙江学刊》，1985(2)。

③ 万经《世传·先考永六府君》，转引自方祖猷《黄宗羲及其弟子宗谱诗文辑佚》，《宁波大学学报》(人文科学版)，1992(1)。

④ 万经《世传·先考永六府君》，转引自方祖猷《黄宗羲及其弟子宗谱诗文辑佚》。

⑤ 郑梁《寒村诗文集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六，第272页。

集》,第448页)此外,主讲者还有五六人。如万斯大,“吾党有君,目之有睛。断是决非,如待廷评。”^①如万斯同,“吾党方有五经讲席,每诸君子考证有所未定,必待季野片言,遂俱折服”。(《杲堂诗文集》,第562页)如陈赤衷,“常为都讲”,(《全集》第10册,第30页)“说《诗》则人解其颐,论《易》则坐折其角,其为吾党所推重若此。”(《杲堂诗文集》,第627—628页)如陈锡嘏,“每遇同人会讲,音朗气和,条分缕剖,群疑开解,雾拨天青”。^②如陈自舜(字同亮),“议论蜂起,先生则徐出一言,有朱云折角之称。”^③以上诸人都是黄氏的杰出弟子。

讲经会要求诸人广泛阅读,博览传注,“每讲一经,必尽搜郡中藏书之家,先儒注说数十种,参伍而观”,(《全集》第10册,第30页)“务在博采,思以求其至是。”^④这样有利于学生开阔视野,积累丰富的知识,然后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个人的见识,培养自得之学,“以自然的当不可移易者为主,而又积思自悟”。(《全集》第10册,第30页)每人在读书的过程中都有收获,因而在每月两次的集讲时,才可能展开热烈的讨论与争辩,“先取所讲覆诵毕,司讲者抗首而论,坐上各取诸家同异相辩折,务择所安。”(《杲堂诗文集》,第445页)“与同志讨论得失,一义未安,迭互锋起,……思至心破,往往有荒途为先儒之所未廓者。”(《全集》第10册,第453页。)争辩不仅活跃了学术气氛,而且通过深入交流,彼此提高了水平,从而创见叠出,黄宗羲便充分肯定他们“发先儒之所未发者,尝十之二三焉”。(《全集》第10册,第30页)

二

甬上讲经会始于康熙七年(1668),终结于康熙十四年(1675),前后历时八年。其解散的原因,万言曾有所提及:“左春、心友、非园、在中、寒~~流~~^流、先俊、笔山、怡庭、沧柱相继腾达,诸未第者皆各以事去经席,遂而中辍。”^⑤尽管如此,甬上讲经会却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:

首先,转变了明末浙东的不良学术风气,通经学古的治学路数得到大力推广。关于这一点,黄宗羲毫不掩饰自己的欣喜之情,称甬上讲经会,“不及十年而能转浙河东黄茅白苇之风,概使之通经学古。”但是这个结果既非那么顺利得来,也并不完全吻合黄氏本人的设想。讲经会在甬上的召开,虽然比在会稽遇到的阻力小一些,但也不是没有引起疑虑与非议:

倡讲五经之会,而无识者且目为迂疏,即质之四方,亦多~~不~~^不悟不合,经学之亡,不独在吾里矣。^⑥

天下之士俱枵其腹,眯其眼,塞其心,瞽瞍焉如一丘之貉,其有奋心笃志,穷经学古者,乡里之人群轰然而笑之,……(范光阳)与其乡之同志十数人,慕蕺山之源流,问

① 郑梁《寒村诗文集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六,第305页。

② 郑梁《寒村诗文集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六,第245页。

③ 范光阳《双云堂文稿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六,第663页。

④ 郑梁《寒村诗文集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六,第321页。

⑤ 万言《管村文钞内编》卷三《登高什序》,《四明丛书》本。

⑥ 范光阳《双云堂文稿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六,第684页。

学于家大人，月有会，日有程，相与励志今古，振拔污流，于是其乡之士莫不窃窃然曰：是殆不欲以进取为事者乎？是殆将为蓬蒿之老生以终者乎？是殆与博奕好饮、不顾父母之养者同为臧谷之亡羊乎？

当时的很多读书人只想走捷径谋求富贵，不愿花费精力去穷经学古，并嘲笑那些埋首苦学者。幸好范光阳及其同志不为所动，后来讲经会的弟子纷纷中第，以前那些嘲笑者才“稍稍信，以为古学之士非惟不妨于进取，或反有助于进取矣”。^①关于黄氏甬上弟子中第的情况，郑梁也有记录：康熙乙卯（1675），中榜者有范光阳、仇兆鳌；中副榜者万言，陈锡嘏则高中浙江省解元。“至是则四子者一时同举，辉映后先，不可谓非师学昌明之一会。然而余窃有惧者，盖以先生之所期于吾党，在富贵科名之外，而不欲诸君子以区区场屋时文之学自竟也”。^②虽然郑梁等人深知黄宗羲期望他们能超脱于富贵功名，专心于学术研究，但在众多的乡人眼里，科举中第无疑是最大的吸引力，大概正是黄氏弟子在科举上取得的成功，才使得通经学古的风气在甬上流行开来的吧。“吾乡自隆、万以后，人物稍衰，自先生之陶冶，遂大振。至今吾乡后辈，其知从事于有本之学，盖自先生导之”。^③虽然动机可议，效果还是值得肯定的。对此，黄宗羲大概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了吧。

其次，甬上讲经会解散后，讲经事业并未完全停止，而被黄氏的某些弟子继承了下来。如陈锡嘏“是时甬上经会中辍，先生忧弟子无所矜式，修举故事，来会之人视昔加盛。先生时临讲席，反复开导，闻者莫不兴起”。^④陈尧山是其同道，“与锡嘏倡讲经之会于甬上，一时英贤毕集，析疑辨难，讨论蜂起。”^⑤而且，陈锡嘏的弟子徐子文当“诸君子或仕于京师，或散之四方，或竟化为异物，良会不常，风流将息”之际，“与其同学之士续举经会，如是者又数年。”^⑥陈锡嘏的另一弟子顾在瞻也继承了这一事业，“岁辛酉（1681），万公择自淮归，言（顾）在瞻倡率其里人为经史之学，不殊甬上。”（《全集》第10册，第694页。）最为突出者莫过于万斯同，如《万季野先生墓志铭》：“家居之日与诸文士为讲经之会，月凡再举，来会者不下百余人。听季野主讲，先《易》，次《礼》，次《诗》，次《书》，次《春秋》，折衷诸儒，援据今古，议论蜂起，闻之者人人以为得所有而归也。”

再次，最为重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人才。对此黄宗羲颇为自得：“今海内皆知甬上，精综六籍，翱翔百氏，危儒行，标清议，一切夸诞馱馱之习击去之，今世夸诞馱馱之妄人，累急甬上，终于不可亲而止，盖十年以来，所称鲁、卫之士，必在甬上也。”（《全集》第《万季野先生墓志铭》册，第680页。）黄宗羲曾对其甬上学生有一个评价：“（诸子）皆有以自见。如万季野之史学，万充宗、陈同亮之穷经，躬行则张旦复、毛孝章，名理则万公择、王文三，文章则郑禹梅清工、李杲堂纬泽、董巽子、董在中函雅，而万贞一、仇沧柱、陈匪园、陈锡嘏且出而准的当时，笔削旧章，余子亦复质有其文。呜呼盛矣！”（《全集》第10册，第453页）利用目前尚可找到的文献资料（以上诸人中多未有著作传世），探讨其中一些重要

① 黄百家《学箕初稿》，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七，第3页。

② 郑梁《寒村诗选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六，第245页。

③ 《全祖望集汇校集注》，第1060页

④ 郑梁《寒村诗选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六，第327页。

⑤ 郑风《寒村息尚编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六，第591页。

⑥ 范光阳《双云堂文稿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六，第636页。

成员如万斯同、万斯大、李文胤、万言等的学术思想倾向,能让我们对黄宗羲经学思想的传播有进一步的了解。

黄宗羲是以经学作为学术的根柢,以其为基础,他提出“读书当从六经而后史、汉,而后韩、欧诸大家,浸灌之久,由是而发为诗文,始为正路,舍是则旁蹊曲径矣”。(《全集》第10册,第323页)文章应“本之经以穷其原,参之史以究其委”。(《全集》第10册,第58页)以上观念被其弟子广泛接受。

万斯大对经学有专攻,著作主要有《经学五书》,即《学春秋随笔》、《周官辨非》、《仪礼商》、《礼记偶笺》、《学礼质疑》。其经学成就受到众人的高度称许。如黄宗羲说:“穷经之士,如子岂多”? (《全集》第10册,第644页)甬上同学郑梁说其“以经解经,不立异,不苟同,不为先入之言所主,不为过高之说所摇,故能推倒一世,亲见古人如此”。^①万斯大的《经学五书》中,有四者是关于礼学的内容,涉足到黄宗羲未能深入研究的领域中去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。

万斯同是众弟子中在史学方面最有成就者,尽管其本人曾声明“吾辈既及姚江之门,当分任吾师之学,今同志之中固有不专于古文而讲求经学者,将来诸经之学不患乎无传人。惟史学则愿与吾兄共任之”。^②但他表示“论读书则先经而后史,先经史而后子集”,“经者文之源也”。^③所以其对《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也有广泛涉猎。其礼学集中于祭礼与丧礼,继承了黄宗羲未曾深入展开的研究领域。其在研究丧礼的过程曾先后向黄宗羲请教,而黄氏则给出了《答万季野丧礼杂问》、《再答万季野丧礼杂问》的书面答复,影响自然可知。其经学的成就,也为世人所承认。如李文胤称其“于经学,能与汉宋诸儒辨及微芒”。(《杲堂诗文集》,第451页)《宁波府志》记述“甬上有五经之会,群疑,(万斯同)一言立解”。^④

李文胤擅长诗及古文,他自称为人处世及学术文章,“俱隐然以(黄)先生在望,心为仰止”。因此也很重视经学,提出“士之学莫大于治经”,经学载道,史学载事,经先史后,其次才是文辞。他曾自谦“某年来苦宿疾放废,于经学史学,茫然无闻,其言不足以为信”。文章缺乏经学与史学的根柢,仅仅追求文辞的铺张华丽,是不可信的。他批评吴中文坛宿老王世贞、钱谦益都缺少坚实的经学根基,“州(王世贞)生平著书惜不从六经入,虞山(钱谦益)下笔综古今,而史学多,经学少,此其所以病也。”(《杲堂诗文集》,第492、466、448页)文章必须以经学为基础,如此才是有本之学。这正是对黄宗羲“文必本之六经,始有根本”(《全集》第10册,第669页。)观点的继承。

万言的文学成就深受黄宗羲等人的推许。李文胤曾多次提及:“黄梨洲先生,于海内文章少所许可,然数称贞一之文,为有戴剡源、归震川风味”。(《杲堂诗文集》,第454页)叔父万斯同也赞扬其文风道:“使我有汝笔,班马不难企也。”^⑤据《宁波府志》、《鄞县志》记载,万言对经学也有一定的研究,“同里讲经之集汇诸先儒之说,参酌

① 郑梁《寒村诗文集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六,第304页。

② 《石园文集》卷《寄范笔山书》。

③ 《万季野先生墓志铭》

④ 曹秉仁《宁波府志》卷25《儒林·万斯同》,雍正九年刊本。

⑤ 张寿鏞《后学张寿鏞序》,《管村文钞内编》附录。

异同, 议论每夺席”。^①这固然有其家学的影响, 但更与甬上讲经会的熏陶分不开。他曾自述此经历道: “言自七岁受书, 学《庸》、《论》、《孟》既毕, 家大人即授以五经句读, 稍长学举业, 初治《周易》, 继治《礼记》, 既复治《尚书》, 顾其解皆讲章训诂, 虽习其说, 意殊未惬。尝欲旁求诸家解经之书而贯通之。自家叔辈与诸君设为讲经之会, 言时客袁州, 闻之亟归, 共业《毛诗》、《戴记》, 追随朔望, 遂得闻所未闻。”^②可见在讲经会之前万言所接触的经学, 都不过是讲章训诂之说; 参加甬上讲经会后, 才真正受益匪浅。

需要指出的是, 黄宗羲创立的甬上讲经会及其学说, 在浙东虽大受欢迎并带来积极影响, 促进了学术研究, 但并未能波及全国, 甚至在其弟子相对集中的北京都未能打开局面, 争得一席之地。陈锡嘏、郑梁、仇兆鳌、万言、范光阳、陈紫芝、陈赤衷、万斯大都先后入京, 并试图传播戴山、梨洲之学。^③如在范光阳入京前夕, 李文胤以传播戴山、梨洲之学委任其人: “今国雯为黄门高弟, 尽得所学, 更负戴山之遗书, 逾江蹈淮, 历齐鲁之乡, 北极燕中, 尽以所藏书转相传授, 使人知今日圣学宗传, 定在子刘子, 而其及门老成尚在, 讲席重开, 一一见诸笔疏, 于是北方之学者, 亦为丕然一变。余知国雯必能力任其事矣, 岂非吾道之光耶?” (《杲堂诗文集》, 第 446 页) 当时统治阶层认同的主流思想是程朱理学, 黄门子弟以传播、发扬师说为己任, 精神是值得称赞的。但是, 企望北方学者能在黄学影响下发生丕变, 显然过于天真了。黄氏弟子入京后的遭遇, 大多不是被外放, 就是穷困潦倒。如范光阳, 虽然黄宗羲自信“以国雯之声名, 为公卿所倒屣, 何难得之”? (《全集》第 10 册, 第 688 页) 但范氏并不如意, “余折肱之余, 幸获一第袞裘羸马, 鹿鹿京尘, 欲如昔日与诸君子留意经学, 辩论异同, 何可复得?”^④万言虽被召入史馆, 任职达 10 年之久, 独立完成《崇禎长编》百余卷, 《列传》若干卷, 但后来生计都难以维持, “晨炊欲绝, 自请外补, 斗大一城, 鹄面苍生, 早蝗子遗, 抚循委曲, 继之涕泣”, 可谓“风尘困顿”(《全集》第十册, 第 95 页) 矣。当然, 他们在京城并非一无所获, 至少扩大了黄宗羲在京师学者中的影响, 如戊午(1678 年)年征召博学宏儒, 叶方蔼就特意推荐黄氏, 被陈锡嘏和黄氏本人婉拒, 但次年《明史》总裁官徐元文仍试图聘黄宗羲修史, 黄氏再次婉谢。叶方蔼于是请朝廷下诏, 令浙中督抚誊录黄宗羲所有关于史事的作品, 送入京城。徐元文延请黄百家、万斯同、万言等参修《明史》。

(作者单位: 吴海兰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361005)

① 《宁波府志》卷 26《文苑传·万言》

② 万言《管村文钞内编》卷《与诸同学论尚书疑义书》。

③ 参见方祖猷《黄宗羲与甬上证人书院》,《浙江学刊》, 1985(2)。

④ 范光阳《双云堂文稿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二五六, 第 636 页。